

清康熙間范鄴鼎五經堂刻書

蘇曉君

內容提要：私家刻書是古代書籍出版中官府刻書、書坊刻書之外另一種普遍而重要的形式。山西范鄴鼎五經堂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過對國家圖書館藏古籍文獻的整理與解讀，從范氏五經堂刻書者的身世以及刻書的資金來源、種類、時間、去向、價值、版本特徵等方面做了一些介紹與分析，力圖簡明勾勒出清初一個鄉間私家刻書者客觀真實的形象。

關鍵詞：五經堂 范鄴鼎 家刻本 私家刻書

雕版印刷時代的家刻本是古籍中的一種重要版本類型。這種刊本指的是以家庭為單位主持或出資委託書坊代為刻印的書籍。傳統書目著錄此類書籍時多用主人姓名及室名堂號來稱呼。其刊刻內容以自己家人著作為主，另外也有聖賢、先輩、師友的專著。古代私家出書是很普遍的現象，相對於坊刻來說，通常他們大都不以牟利為主要目的，所刻書崇尚學問，更著重於文化知識的推廣，校勘刻印認真，因此版本比較精良。明清時期出現過兩個堂號同為五經堂的刻書者。明代五經堂曾刻印過宋呂祖謙編輯的《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鑒》150卷目錄3卷；清初范鄴鼎的五經堂雖出現晚一些，但辛苦經營了數十年，刻書更多，影響更大，堪稱晉南私家刻書的代表。

一、三部書和范鄴鼎

清康熙年間山西洪洞范氏五經堂所刻書有三部現藏於國家圖書館（下稱國圖）中，分別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晉國垂棘》、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理學備考》和康熙末年的《五經堂合集》。^①

《晉國垂棘》有三編，初編由明范弘嗣編輯，其孫范鄴鼎重訂，二、三編由范鄴鼎續編；初編、二編刻於康熙十一年（1672）。國圖館藏的這部書，是康熙二十四年三編刻成後的合印本。“垂棘”本指春秋時晉國出產玉石的一個地方，後為美玉的代稱。這部被譽為晉國美玉的文集，彙編了三晉古文中有關世教、有資舉業的經典文章，旨在繼承和弘揚鄉邦文化，全書共27卷。

《理學備考》由范鄴鼎刪定，共34卷，屬於史部傳記類著作。書中廣採明代理學

諸家緒論並附以己說，議論醇正，為《四庫全書》收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編備列有明一代講學諸儒，初刻於康熙辛酉（1681）。卷一至卷六擷取辛全《理學名臣錄》，卷七至卷十擷取孫奇逢《理學宗傳》，十一卷至十六卷乃鄺鼎所補也。續刻於己巳（1689），再續刻於甲戌（1694）。十七、十八卷擷取熊賜履《學統》，十九卷至二十九卷擷取張夏《洛閩淵源錄》，三十卷至三十四卷擷取黃宗義《明儒學案》，計所自作僅六卷而已。其說不出於一家，其文不出於一手，宜其體例之參差矣。”^②文中關於這部書的刊刻時間與范氏家人的記錄不符，在其子范翱的文字記載中，這部書始刻於康熙十七年（1678）比其早三年，成於康熙三十二年比其早一年，歷時15年纔告竣。

《五經堂合集》五卷，成書時范鄺鼎已辭世，由他兒子范翱編輯，雕版大約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范翱考中舉人後不久。書中收集了范鄺鼎各時期的詩文，分為文集、語錄、野歌等，另有他人撰寫與其有關的各類文章，包括崇祀錄、行狀、墓誌等。

國圖所藏這三部五經堂刻本，其價值不只在版本上，它們對於考查范家刻書歷程也是難得的原始資料。各書中有很多與刻書相關的細節，經過對這些點滴記錄的擷拾和條理連綴，有關范鄺鼎的身世及刻書的資金來源、種類、時間、去向、價值、版本特徵諸方面大致輪廓就顯現出來。它展現的不僅是一人一個家庭的經歷，也是清初私家刻書狀況一個突出的側面。

范鄺鼎（1626—1705），《清史稿》有傳，云：“范鎬鼎，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闡明絳州辛全之學。康熙六年進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間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未起。立希賢書院，置田贍學者。”^③

范翱曾撰寫過一篇他父親的“履歷”，將范鄺鼎一生的經歷介紹得更為具體詳實：“范徵君諱鄺鼎，字彪西，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師曠里三甲人。由平陽府學中丙戌（1646年，20歲）五經副榜，辛卯（1651年，25歲）舉人，戊戌（1658年，32歲）會試副榜，辛丑（1661年，35歲）中式，丁未（1667年，41歲）殿試三甲進士，甲寅（1674年，48歲）循例告終養，戊午（1678年，52歲）薦舉博學鴻辭，告病免召，癸未（1703年，77歲）聖駕西巡，欽賜‘山林雲鶴’匾額。生於天啟丙寅（1626）九月二十二日，終於康熙乙酉（1705）三月初六日，享壽八十歲（實歲79）。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十五日，平陽府學遵奉擇吉置主入祠，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洪洞縣學遵奉擇吉置主入祠。”^④在范翱記憶中范鄺鼎是一位身體修長、清臚爽直、終身好學不倦的人：“（徵君）長身疎肩，清臚如鶴立，吐音宏亮清便，無嘔噦態。性通敏，好讀異書……先君少時銳志力學，翹然自喜；中年方嚴沉毅，將大有為於時；晚而學道，遠稽近考，神解意會，曉然以聖賢為可至……”^⑤康熙六年（1667）范鄺鼎41歲中三甲一百零六名進士，因母老終養棄仕，在家鄉辦學、刻書終其一生。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西巡回鑾途中，特別讚譽道“山西進士范鄺鼎是個真正理學”^⑥。此時他已是耄耋老人。

范鄺鼎篤好理學，崇尚先賢，並十分重視他所信仰理念的推廣。其傳播的主要方法辦學之外就是刻印儒家正統書籍。對此，他的學生也有過評價：“二十年餘，五經堂藏板充棟，皆是表彰昔賢先儒，何嘗為自己博名地，又何嘗有一言涉風雲月露。如此立言，乃是程朱嫡派，薛胡功臣……”^⑦自37歲開始，直到去世前一年，范鄺鼎40餘年

嚴正持身，淡泊名利，以傳道刻書為己任，縮衣節食，藏板充棟，業績顯著。當他 63 歲回首往事時，自己也做過一個總結性的表述：“子程子曰：閑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吾輩別事做不得，惟有補綴聖賢遺書。鼎抱病閉戶，不入城市者二十有四年。病間無事，不敢逸居，遠搜一代實學，近輯三晉文獻，上自御製《勸善》、《牛戒》諸書，下逮前哲、時賢一言一行之長，旁及九流四民街談方言，倘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彙刻成書，施散無數。不避二氏之嫌，不致一勝之掩，總是與人為善之愚誠，非敢自作聰明，自誇詩文也。鼎耕讀傳家，安貧守拙，雖蟲終老，人微言賤，非賴助刻則書不能成，非賴公移則書雖成而不能傳……”^④與人為善、安貧守拙是他處世的信條，廣集聖賢典籍、彙刻前哲遺書便是他追求的目標，而不懈不怠堅守這一信念對范鄴鼎來說是始終如一的。

二、刻書資金來源

刻印一部書的環節很多，單製作工藝講就需要經過版材製作、書稿謄寫、雕刻印刷、裝訂成冊等多道工序，若要完成整個過程，除人工之外，在原材料如板材、印墨、紙張等項也要有大量的花費，因此沒有一定資金做保證是不可能進行的。范鄴鼎雖是鄉間名士，衣食無憂，但從經濟承受能力講，尤其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刻書，長年下來所投入的就會更大，因此對他來說也並非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綜合起來看，他刻書的資金來源主要有這樣幾個渠道：

首先是靠大家的捐助。這通常都是對一些較大的書而言。例如《理學備考》，卷首就詳細開列出了很長的單子，記錄下助刻人姓名、身份、捐資金額等內容：

萬涵李公祖，諱元陽，直隸大興人，貢生，分守河東道台，十二兩。

中甫張公祖，諱大本，遼東人，甲午舉人，由御使分守河東道台，三十兩。

孟樞徐公祖，諱誥武，江南金壇人，辛丑進士，巡按河東鹽台，二十四兩。

……

其中助刻者有進士、舉人、貢監、布衣、貢士、歲貢、拔貢、道台、鹽台、知府、知縣、主事、廣文、司業、督學、郎中、侍郎各類人等四十位，共襄此舉，捐資有差。所以他在單子之前自謙地說“姓字奉為總裁，是利也，是諸君子之力也，余小子不過分校閱之一班焉耳。”

一些不大的書，也有完全由一個人出資贊助的，如《續垂棘編三集》。康熙二十四年正月，這正是過年的月份，范鄴鼎很感慨地寫下了一篇序文：“……余病臥深山，仰止月湖諸公，日作執鞭想，切自揆搜輯有明三百年理學，得八十餘人，計一十六卷，藏稿有年，刊刻無力，篇殘矣，簡蠹矣，將來湮沒於寒煙荒草已耳。勉庵社台聞而喜，惠二十金督工，俾八十餘人付梓，梓甫成，惠一十二金購紙，俾八十餘人畢傳。或曰勉庵是役，敦舊好也……”^⑤他的老朋友王勉庵社台考慮得十分周到，從督工刻板到購紙印刷的費用全都包了下來，解決了范鄴鼎“藏稿有年，刊刻無力”之憂。這種幫助展現

出了兩人間惇厚的情誼。類似這種情況時常會出現。在《聖賢像贊》的序文中他也提到：“南明賈封翁，謙虛好善，每以濟人利物為心……如是，南明聞茲言，遂攜予案頭《聖賢像贊》歸，捐資重梓，以傳命予述前言，以作之序。”^⑩這位賈封翁話語不多，推崇聖賢，慷慨解囊，舉動更顯得爽快。

對於這些捐資人，范鄺鼎總是滿懷感激之情，並且還選擇了一個固定的形式來表達，自云：“予刻書多矣。諸君子犒工之惠，有分與義不容卻者，必告至聖先師及先聘君、先贈君前，然後膜拜而受。或予病未間，必遣子侄及門輩代之……”^⑪先聘君是范鄺鼎的祖父，先贈君是他的父親，到先人和孔聖人牌位面前膜拜，以這種莊重的方式來表示他真摯的謝意。

田租是另外的一個來源。從現有的資料看，范家祖上並非殷實之家，只是到范鄺鼎這代經過幾番努力考取功名後，置田租地，生活纔有所改善。范翹回憶其父說：“辛卯廿六歲，中鄉試第四十四名……坊金那（挪）以置田”；“辛丑卅六歲，中會試第一百四十二名……又置田積粟，家由此稍裕……”^⑫在逐漸富裕起來後，范家纔會有餘力來刻書。范翹還有這樣的記錄：“家有薄田數百畝，入租以供餽粥，就其仍以為開雕之資。”^⑬這就是說，除保證日常的生活開銷，范鄺鼎將其餘租金大都用在雕刻書籍所需的開支上了。

再有就是平日的積攢。范鄺鼎刻書以外，為了授經傳道還曾創立了希賢書院。下面是一段講述建立書院經歷的文字，從中可見他是如何一點一滴來積攢的：“始余創義學於住宅東隅，北東西建房十間餘，從學者愛衆愛有，欲增其式廊，而力不給。偶讀王慶我‘生財歌’而悟之。歌曰：少吃一隻雞，可買五日菜；少穿一疋綢，舉家有鋪戴。於是一葛衫三夏，一棉布袍六冬，一葛布袍十二夏。紗羅綾緞，自祭祖先、謁大賓外，暫不褻不燕，年五十有二……”^⑭范鄺鼎長年布衣糲食，不褻不燕（衣食不鋪張），而且終身弗易。書院是靠這樣平日點滴積攢建立起來的。一些刻書費用的積累也不會例外。總體來看，他人的幫助和租金的積蓄與自身節省，就是維持他興學刻書的主要資金來源。

三、刻書種類和時間

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成的《理學備考》卷首，特意刻印了一篇簡明的“五經堂既刻書目”，有書名及卷數，對范鄺鼎此前刻的書也是一種推廣和宣傳。這個書目編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季，分為內篇、外篇、續補三部分：

內篇（三十八種）

《御製勸善要言》一卷

《洙泗纂規》一卷

《明儒廣理學備考》三十二冊 未完

《薛文清公讀書全錄私箋》十七卷

《辛復元治學一貫錄》兩卷

《御製牛戒匯鈔》附續刻兩卷

《明儒理學備考》二十卷

《薛文清公行實錄》三卷附年譜

《辛復元四書說》六卷

《辛復元侍側紀略》一卷

《辛復元六諭解》一卷	《辛復元別有詩》兩卷
《三晉語錄初集》十卷	《三晉語錄二集》兩卷 未完
《重訂晉國垂棘》一卷	《續垂棘編初集》六卷
《續垂棘編二集》十卷	《續垂棘編三集》十卷
《三晉詩選初集》十四卷	《晉詩二集》十卷 未完
《仁者贈二集》十卷	《仁者贈三集》兩卷
《仁者贈四集》十卷 未完	《吳伯瑛刑戒》一卷
《劉訓夫文體條約》一卷	《先聘君做人鏡》兩卷
《先聘君長生箋》一卷	《三錫集》兩卷
《終養節錄》兩卷	《節哀集》一卷
《范氏家譜》三卷	《五經堂年譜》一卷
《洪洞志備考》未完	《三晉名宦備考》未完
《三晉鄉賢備考》未完	《五經堂草初編》四卷
《五經堂野歌》一卷附俚對	《五經堂草二編》兩卷 未完
外篇（十四種）	
《關帝書》一卷	《開卷有益》一卷
《玄帝聖訓》一卷	《文昌化書》四卷
《純陽化書》三卷	《金剛經刪注》一卷
《袁顏合刻》一卷	《學者須知》一卷
《功過格》一卷	《觸目警心》一卷
《三錄合刻》三卷	《因果錄》一卷
《三官諸經合刻》一卷	《痘疹方》一卷
內篇續補（一種）	
《許西山先賢位次記》	

這三篇書目總計 53 種，其中內篇有八種書還沒有完工，范鄴鼎時年 62 歲。

康熙四十九年（1710）范翹撰寫《先子類記》時，范鄴鼎已過世五年，文中更詳細地記錄了他生前具體刻書名稱和時間，除上面書目之外另有所增加，兩者可互為補充。這篇《類記》依年敘述，其中的年齡表示是虛歲，也就是比實際要大一歲。茲節錄如下：

壬寅（1662）卅七歲，始輯刻《三晉語錄》；

乙巳（1665）四十歲，刻《居鄉箴》；

己酉（1669）四十四歲，刻《刑戒》及先曾王父《做人鏡》；

庚戌（1670）四十五歲，刻《勸善書》一十四種，《斗方》廿餘種，分為外篇；

辛亥（1671）四十六歲，刻辛復元先生《倚側紀略》，先曾王父《長生箋》；

壬子（1672）四十七歲，重刻先曾王父《晉國垂棘編》，遞刻《續垂棘編初

集》；

癸丑（1673）四十八歲，刻《洙泗纂規》、《聖壽考》、《三晉詩選》；

乙卯（1675）五十歲，李公諱元陽始捐助刻資，刻《仁者贈二集》；

丁巳（1677）五十二歲，刻辛著《四書說》、《治學一貫錄》諸書，刻《續垂棘編二集》；

戊午（1678）五十三歲，始刻《明儒理學備考》，辛先生《別有詩》，《薛文清公行實錄》；

庚申（1680）五十五歲，始刻《明儒廣理學備考》，帙重，歲久乃竣，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

辛酉（1681）五十六歲，刻《節哀集》；

癸亥（1683）五十八歲，刻《五經堂二十戒戒詞》、《謝客疏》、《五思句言引》；

乙丑（1685）六十歲，刻《續垂棘編三集》、《辭祝壽疏》，輯刻《仁者贈三集》；

丙寅（1686）六十一歲，刻《仁者贈四集》；

丁卯（1687）六十二歲，刻《三晉語錄二集》、《范氏家譜》；

戊辰（1688）六十三歲，重刻《先賢位次記》；

己巳（1689）六十四歲，刻《薛文清公年譜》；

壬申（1692）六十七歲，刻《師善錄》；

癸酉（1693）六十八歲，《理學備考》三套、《廣理學備考》一十二套兩書告成，刻《朱子性理吟》、《續垂棘編四集》；

甲戌（1694）六十九歲，刻《侍側偶憶》；

丙子（1696）七十一歲，刻《朱子童蒙須知》；

壬午（1702）七十七歲，輯刻《國朝理學備考》；

甲申（1704）七十九歲，刻《天顏有喜注疏》；時維康熙庚寅（1710）大寒日。

這個表單可以看做是對范鄴鼎一生著述及殫心於廣集聖賢典籍、彙刻前哲遺書主要成果的總結。包括了他自己編著的書，也有其先人和他人的著作，其中“《斗方》廿餘種”刻於50年前，大概因為時間太久記憶模糊，所以是個粗略的估計。以上兩個書目中或有同書異名者，不過前後算來，從36歲到78歲這四十二年中，他刊印各類書籍至少在百種以上。這個數量對一個私家刻書者來講絕對不是小數。

四、刻書去向

五經堂所刻書被官府徵調是件很榮耀的事，也是其刻書的一個主要去向。在《理學備考》書前有“上臺公移紀略”，就記錄多項：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諱梅，直隸故城人。憲票取五經堂所著書，呈送撫台土大宗師咨部。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諱繼祖，滿洲人，帖文。蒙河東鹽台黃大宗師，諱斐，浙江鄞縣人，憲牌取五經堂所著諸書，貯藏本府庫內。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大宗師，諱士賢，瀋陽人。奉撫台圖太宗師，諱納，滿洲人，命帖行臨汾縣正堂王宗師，諱永露，山東益都人，來徵五經堂諸書，每種索其一而歸……

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范鄴鼎撰寫的“壽永和王明府序”也提道：“……去冬十一月，明府佻來，徵余所刻全書以歸。余所刻全書，雖奉當路檄，通省徵取，一時來徵者雖多，未有如明府之情摯而詞懇，求之詳而且切者……最愛余兩種理學，每種又徵其十餘部以歸……”^⑤

范氏五經堂刻書不以牟利為目的，主要是為了宣揚正統的理學思想。這與清朝前期極力提倡的宋明理學相一致。此外加上有些書還曾榮光地進呈御覽，所以會得到當權者的捧場，大量徵取。但這只是個例，不是所有私家刻書者都有這麼幸運。

刻書不同於抄書，一定是批量的。五經堂刻書不可能都被官府包了，日常的商業性銷售按理說也應該是存在的，但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卻始終未見記載。中國歷來有文人恥於言商的說法，所謂君子言義不言利，或因是范家避而不談。不過之前提到的“五經堂既刻書目”被放在了卷首的位置，這種做法在坊本中常見，為的就是推廣促銷，不知范鄴鼎是否也有此意。而外，上面引用過他在《理學備考》題識中有“倘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彙刻成書，施散無數”之語，因此這種無償贈予也應該是一個主要的去向。

五、版本特徵

五經堂刻本有固定的版式，從行款看基本都是九行二十五字，行字間多加印有排列緊密的墨圈，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字體較小，分為軟硬兩種。硬體字，也叫宋體字，是明朝中後期形成的一種較為規範的刻書字體，清代仍在沿用。其字雖略顯板滯生硬，但不論寫板與雕刻都比較易於把握，看上去也比較整齊，在坊間很流行。《理學備考》就是這種缺乏個性的硬體字，因此這部書很可能是由書坊代行刻印的，也就是出資者和刻印者分屬兩家，范家是委托者，書版所有權、使用權歸五經堂，書坊只是受雇的刻書者。

在家刻本中，除了這種委托的方式外，還有一種就是自家刻本，這需要自備木板，按照主人的意向鳩工雕刻。《晉國垂棘》為軟體字，是手寫上板的楷書字體。卷端下刻印有“范一偉、范爾梅、任重任、曾孫翼手錄”雙行題記，說明這部書是由他們四人分別書寫的版樣，然後交由刻工刊刻的。版心下還鐫有“五經堂重訂”五字，所以它

更像是一部由自家雕刻的書。當然版樣寫好後，交書坊雕刻也是很有可能的。范邨編刻的《五經堂合集》也是軟體字，且整部書楷書字體多有不同，表明曾經有多人參與過寫板，書中沒有留下有關刻書的文字記錄，總體風格與《晉國垂棘》相類似。有關書寫版樣的情況，在范邨鼎的文集裏也偶有記錄，如他為辛全^⑩《侍側紀略》所作的序文中首先就說：“此辛復元先生行實也，因予徵三晉人文而得之。於是刪其冗、訂其誤，附以評語，命子侄程日共書，授梓。”^⑪後句話的意思是范邨鼎在對原文做了校勘刪訂後，讓晚輩們抓緊抄錄寫樣，以便盡早雕版成書。

總體看，五經堂刻書更注重於實用，版式類似清代常見的制藝類刻本，小字且排列緊密，版本樸實無華，處處都體現出主人質樸節儉的風格。

六、餘話

五經堂刻書雖然不甚講究版本式樣，但對選刻他人書籍的內容及標準卻是很重視。在《理學備考》卷首，有范邨鼎撰寫的“助刻姓字”一文，對選取今人、古人著作就有特別的強調：“鄙性硜硜，所造三晉文獻，間有今人著作，此內交要譽之嫌，不可不謹也。近刻如《讀書全錄》、《理學備考》，如《廣理學備考》等，人既作古，書有隔世，則無此嫌矣。”^⑫文中的“三晉文獻”就是指《續垂棘編》，這部書共分四集，收錄有古今各類人的文章，雖說是凡有關世教、有資舉業者都可入選，但畢竟人有良莠、文有高下，因而擇優汰劣時，選擇更要慎重，尤其是健在人的著作。

刻書過程有時也會遇到一些麻煩事，面對非議他表現得十分豁達淡定。他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余刻《三晉詩選》行世已久，偶被仇敵某商人呈之當事，以不識忌諱為詞。當事令識者觀之，僉云無可議者，其事遂寢。余聞之，凡有刻書俱檢點一番。《傳習錄》曰：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信然。”^⑬毀譽榮辱不動心，反而更加磨煉了他的意志。這不單單就刻書而言，也是他終生堅守的信條。

范邨鼎對自己做過一個很形象的描述：“牙籤無數，似一書賈；字板世藏，似一梓匠；固辭徵聘，而欲一布衣終其身，似一老頭巾；姑舍子之千百著述，而惟以《備考》兩書尋章摘句，似一迂拙腐儒。”^⑭所謂似書賈、似梓匠、似布衣、似腐儒，他將這四種不同身份融為了一體，不過僅僅是相似而已。這個似字用得很恰當，因為外表看來似乎很像，實則似是而非。或可概述為聚書廣而不自閉，刻書多而不逐利，功名舉而不求仕，讀書專而不迂腐，這是一位哲人在年過知天命以後精彩的自述。

五經堂刻書共有三種被《四庫全書》收入，分別是《五經堂文集》、《理學備考》、《續垂棘三、四集》，其中《理學備考》最為著名。《理學備考》包括康熙三十二年刊成的《明儒理學備考》。它彙編的是明代理學諸儒的傳記，其主旨是以人存學；《廣理學備考》則輯錄理學諸家的語錄和詩文，其主旨是以言見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輯刻的《國朝理學備考》，編輯的是清前期諸儒的簡歷、語錄、詩文以及評論，人言並舉來闡發理學思想，體例更為完備。這三種《備考》是研究明清理學的重要資料，也是范邨鼎被尊為山右清代儒學宗師的代表著作。其中五經堂《國朝理學備考》，現僅見

道光五年（1825）的重修本。

在康熙二十七年夏季，前兩個《備考》已編輯完成尚未刻成時，范鄴鼎撰寫了“兩種理學書成告祖父問”一文，其勤勉自勵也溢於言表：“《備考》兩書皆明醇儒，詩文不一，道理無殊。愚孫不才，受此心裁，是則是攸，敢《理學備考》不勉哉！既欲自勉，又欲勉人。自惜微賤，終窶且貧，名公好善，僉來助刻。志乃姓字，表乃嘉德，名公序文幾二十篇，窮愁著書，附驥斯傳……”^⑩書前所冠名人賢士的序跋寫於康熙十七年到二十二年，六年中共得十九篇。這個數量在一般古籍中也是不多見的，足見它受到普遍讚譽並被認同的程度，而此書輯刻完成時，他已經是76歲的老人。

三種《理學備考》的書板，在范鄴鼎去世120年後仍然被他的後人保存着，只是不甚完整。道光五年一個名叫張恢的洪洞人，出於對他的尊崇，投資重新整理了這部書板，並撰寫了一篇序文說明經過：“……今春，恢與先生後裔再三商榷，勉襄是舉，備資斧，鳩工人，補刊《明儒理學備考》廿葉，《廣理學備考》三百九十九葉，《國朝理學備考》十二葉。開雕於孟夏既望，至季秋而告竣。先生授梓諸書數十種，各有殘缺，未遑一一修補。茲先自《理學備考》始，其餘俟徐圖也……道光五年歲次乙酉秋九月朔日，同邑後學張恢書於修業齋中。”^⑪張恢從道光五年孟夏到季秋，用時六個月，共補刻書板431塊，重新刷印，使之再現於世，是為重修本，也是三種《理學備考》的第二個版本。

山西平陽府自古文化事業就十分發達，產紙豐富，書坊衆多，在金代曾是中國北方的刻書中心。清張金吾在《金文最》中介紹當時景況就有“家置書樓，人蓄文庫”的描寫。清初五經堂經過不懈的努力延續了這一文脈，而且業績輝煌，可謂後續之翹楚。范鄴鼎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刻書家。古人有言“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他正是堅持着這樣的信念著書立說，刻書傳道，孜孜以求，走過了看似平淡的一生。

注釋：

① 現存的五經堂所刻書除此三部外另有《三晉語錄》、《三晉詩選》、《晉詩續雅》、《晉詩二集》等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臺灣傅斯年圖書館。

②（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第877頁，中華書局，1997年。

③《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七儒林一，第3362頁，中華書局，1998年。文中“鄴”字誤作“鎬”。

④《五經堂合集》第一冊，“崇祀鄉賢錄”首篇。

⑤《五經堂合集》第一冊，范翻撰“行狀”。

⑥《五經堂合集》第一冊，康熙五十二年范翻序。

⑦《五經堂合集》第二冊，范鄴鼎“三立祠序”文後之闕擢題識。

⑧《理學備考》冠范鄴鼎康熙二十八年暮春題識。

⑨《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康熙乙丑正月“王劬庵鄉賢錄序”。

⑩《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康熙己巳五月范鄴鼎“聖賢像贊序”。

⑪《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庚午（1691）五月范鄴鼎“及門起予記”之三。

⑫《五經堂合集》第一冊，康熙庚寅范翻大寒日撰“先子類記”。

⑬《五經堂合集》第一冊，范翻撰“行狀”。

⑭《五經堂合集》第二冊，范鄴鼎撰“希賢書院碑記”。

- ⑮《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庚午（1690）八月“壽永和和王明府序”。
- ⑯辛全：明萬曆崇禎間山西絳州人，字復元，號天齋，學者，理學家。
- ⑰《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康熙辛亥正月“侍側紀略”。
- ⑱《理學備考》卷首，范邨鼎撰“助刻姓字”。
- ⑲《五經堂合集》第五冊，“五經堂語錄”之一。
- ⑳《五經堂合集》第四冊，康熙戊午閏三月“五經堂主人自贊”之二。
- ㉑《五經堂合集》第二冊，康熙戊辰夏“兩種理學書成告祖父問”。
- ㉒清道光五年洪洞張恢重修本《理學備考》之“補刊《理學備考》序”。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組）